一分钱不敢用 何如一分钱不敢贪

5月15日，茂名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育英涉嫌受贿行贿受审。据悉，朱育英先后收受了当地57名干部共计人民币1238万多元、360万港元、20万美元，检方指其受贿物品包括挖掘机。朱育英称，收了这么多钱后，一分钱都没敢用。

1700多万，多乎哉，不多也。在贪官纷纷成为“亿元俱乐部”成员的情势下，1700多万恐怕连“大贪官”也称不上。朱育英贪腐“亮点”在于，他在“一分钱都不敢用”的同时，连庞然大物挖掘机都照收不误。时下，贿赂“转型”，转入“雅贿”与“期权”时代，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已经过时，朱育英似乎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对沉甸甸的“硬通货”有偏好。

“一分钱都不敢用”隐喻他对权钱交易、收受贿赂是何种性质的行为以及行为的风险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时刻准备“赎罪”，一旦事发，全额退赃，减轻罪行，获得轻判。既然如此，他为啥好像“病已上身”，最多一次收百万贿款，连笨重的挖掘机也一样“笑纳”？看似不可思议，实是人性贪婪与监督失灵使然。

据说非洲有一个抓猴子的方法：把果子放在树洞里，树洞刚好能让猴子把手伸进去，但是猴子拿到果实之后就没办法把手拔出来，猎人轻易地就能把贪心的猴子抓住。猴子若此，人何尝不是？贪婪是人性的弱点，自古皆然，中外如一。你承认，或者不承认，它都摆在那里。在形形色色的利益、欲望面前，具有天然免疫力的“圣人”毕竟是少数，仅以教育式的他律、自省式的自律，难以让廉洁成为大多数公权者的行为准则。

当利益输送呈现“链条效应”，卖官鬻爵成为潜规则，处于链条中端的无疑就是“二传手”。他一方面是“大鱼”眼中的“小鱼”，成为别人盘中那道小菜；另一方面，他又要不断吞食“虾米”，以攫取足够的“营养”。社会曾广泛流传某位官员在接受调查期间大放厥词，“真让我交代，我能交代3天3夜，把××官场翻个底朝天！”这些话也许有夸张成分，但绝非诳语。如果不是买官卖官在当地蔚然成风，茂名也不可能有200多干部同时跌入“罗荫国案”的漩涡。朱育英亦然，他在大肆收受下层官员贿赂的同时，也向罗荫国“进贡”，以谋取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职……

反腐议题讨论到今天，已经不再是技术层面的“方法论”——用什么招数对付腐败。社会贪腐成风意味着什么，相信大家都十分清楚，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召开的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提到，“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堪称警世良言。

然而，对一些基层官员而言，利剑出鞘，难免伤及自身，一旦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许多人立马就成了“口头革命家”，口惠而实不至，非不能至，不愿至。反腐之难难于上青天，难在利益关系调整。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固化，公共政策制定者的阶层也得到较大提升，有的进入既得利益集团行列。这一变化的现实困境在于，当公共政策制定者对调整社会利益关系、改变利益格局的公共政策投鼠忌器，公共政策出台就会出现“迟滞效应”，哪怕是一些被理论、实践双证实的反腐高招也不例外，一如官员财产申报制。

政府职能归位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反腐败更是如此，需要刮骨疗毒、壮士解腕的勇气，让“一分钱不敢贪”成为现实。 **练洪洋**

“山东首富”张士平家族的魏桥集团，在邹平魏桥镇自办电厂、自建电网，打破电网公司的垄断，平均电价水平比电网公司低1/3以上，让当地企业和居民用上价格更低的电。而在这期间，魏桥集团曾多次与国家电网下属山东电力公司发生冲突，既有在政府层面的“文斗”，也有在田野间的“武斗”。

民间自办电厂为何能“低电价生存”

电企之间的“武斗”，上个月陕西也曾发生过。陕西地方电力集团和国家电网陕西省分公司在4月25日发生武斗，据说这是继2008年之后，两大输电企业发生的第二次激烈冲突。稍有区别的是，一个是“上下级”电企之间的矛盾，一个则是民企和垄断央企之间的矛盾。

仅就“武斗”背后的意义而言，显然“魏桥电厂”与国家电网山东电力公司之间的冲突更具深层涵义。表面上看是地盘利益之争，但其价值正在于“民电”的出现，不但打破了电力垄断“一家独大”的局面，而且戳穿了电价高的真相。

在当地，“国家电网的电8角多一度，魏桥集团只要6角多”，而且0.6元/度是魏桥集团对外供电中较高的商业用电价格，如果商家用电量大，电价还可以更便宜；在魏桥集团的家属区，魏桥集团的供电价格是0.35元/度，而家属区之外，国家电网的居民用电价格超过了0.6元/度；魏桥集团自己旗下企业的用电价格不到0.3元/度，而当地的工业用电价格接近1元/度。这让高电价之外，还一直要求涨电价的垄断电网情何以堪？

厘清时下的电力问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方面是普遍性“电荒”，缺电严重；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却不时发生“窝电”现象，富余的电力卖不出去，如陕西电企之间的“武斗”，原因即在于“陕西地电”想搞特高压项目，以摆脱电源长期受困于西北电网，自己富余的电力卖不出去的尴尬境况。按说这是好事，当国家电网供电不足，由“地方电”或“民营电”来弥补，形成互补格局，既形成竞争，又能解决“电荒”，何乐而不为？

然而，这必然对处于垄断地位的电网公司形成冲突，甚至会出现“抢地盘”的利益之争。因而，尽管在国有电厂人眼中，“魏桥电厂”还存在着环保等方面的问题，但这种“民电模式”的低电价，至少表明：其一，以“电荒”为由涨电价一说还欠缺足够的说服力；其二，电价完全可以通过成本控制降下来，所谓的垄断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很难站住脚。

客观地说，电力改革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在“厂网分开”后，如何打破垄断，建立竞争、开放的电力市场，形成多方竞争的供电格局，以及如何解决发电企业亏损、电价不断上调的问题，都是电力体制改革绕不开的话题。但“魏桥模式”的出现，为电力改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遗憾的是，电力行业人士认为，“魏桥模式”仅是个例，在其他地区难以复制。

而更令人费解的是，有消息称，国家电网与魏桥集团达成了共识，欲重新联网，实现双方互利共赢。是“民电”被“收编”？还是真的要“联网双赢”？公众只能拭目以待。但愿“魏桥模式”的低电价不是因为触动既得利益而仅仅停留于个例层面。 **李龙**

日前《羊城晚报》的记者暗访报道披露，深圳惠州交界的万利生猪批发市场日产死猪可以达到十多头，这些死猪被人以200元/头的价格收购拉到深圳坑梓一带的私宰场屠宰后流入市场。坑梓一个小山内暗藏十多家私宰场，每晚上百人通宵达旦屠宰，饭店、商店一应俱全，宛然是一个私宰产业园。

比死猪肉更可怕是肮脏的利益链

死猪肉流入市场之害无需赘述，相关法规早已不缺，政府喊打喊杀声更是不绝于耳，为何死猪还能在相关部门设置的检验检疫等关卡前畅通无阻？死猪私宰形成“产业园”是否从来不漏风声？在全国上下将食品安全作为“头等大事”加以严管之下，猪肉市场监管为何还是不堪一击？这是一串需要回答的疑问。

毫无疑问，按规定应销毁做无公害处理的死猪被收购、运输、私宰，再流入各大市场，形成一条黑暗的地下产业链，足以令人不寒而栗。而较之黑心之徒“发死猪财”更可怕的是背后的诸多原因。比如：批发市场的检验检疫所任由死猪进入，关卡犹如空设。生猪抽检由货车司机自取尿样，无检验检疫人员监管，不理车上有无死猪。这些恰好为后来死猪被轻而易举运走埋下伏笔。

事实上，私宰死猪肉问题在深圳并非闻所未闻。前年3月25日《羊城晚报》就曾报道，福龙路立交桥底集中有五个私宰场，大批死猪病猪流向市场。记者举报后，执法部门出动清除，但50头猪只查扣6头，明明已拦下近10辆运送车却以“怕冲突”为由让开通道，让装满私宰猪的人货车全部走光。此起执法人员“赤裸裸渎职”事件留下诸多疑窦，令人一直不解。

诚然，就此次暴露的私宰死猪形成产业链的问题，眼下的疑惑、猜测可以说都还是公众惯性思维的推理，事件是否存在更多内幕尚有待深挖，但报道披露的细节已使人无法忽略。这不禁让人要问：难道仅是公职人员偷懒与监管有漏洞这么简单？

无独有偶，16日《新快报》披露，东莞市检察院近日依法逮捕了中堂镇中心屠宰场稽查队队长王某昌和队员陈某基，查实两人在对东莞江南农批市场进行私宰猪肉日常巡查管理过程中，明知有人卖死猪排，却6次收受“好处费”9600元而由他去。这也是继查处中堂镇原经贸办副主任黎某文后，中堂“毒腊肉案”再次被查处的“保护伞”。

在疯狂逐利的语境下，有利可图必有丧尽天良以赚取一本万利之人，以致食品安全成为公众心理最大的恐惧。无论法规与制度如何完善，政府如何强调，都还是“纸上谈兵”，其效力必须执行力保证。在利益输送之下，某些政府监管部门人员黑眼珠只认白银子，将上升为国家意志的“餐桌保卫战”不当一回事，将公职人员义不容辞的职责扔到一边，将事关人民生命安全的食品监管关卡敞开，助纣为虐，这已经不乏案例。

因而，对于深圳此起曝光的私宰死猪产业链事件，其中涉及哪些人失职渎职，是否潜在类似东莞中堂“毒腊肉案”那样肮脏的权钱交易、利益输送问题？深入彻查并将真相公之于众已经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广东“三打两建”的态势之下，若仅是将私宰死猪窝点端掉了之，不对失职渎职者问责，不深挖是否有“保护伞”，不杀一儆百，显然是不能让人信服的。而且，完全可以预料，一旦仅流于“运动式”执法，“风头”一过，见利忘义、明知故犯的犯罪行为必然卷土重来。 **牛日成**

“洋奶粉”价格竟为原产地四倍

据广州日报5月16日报道，目前，原装进口的“高端洋奶粉”已经成为国内不少妈妈的首选。一位妈妈和记者分享了自己购买“洋奶粉”的“新发现”时指出，德国某洋品牌原装进口的有机婴幼儿奶粉价格为318元600克，网上直接找德国代购洋奶粉“水货”价格仅为160元左右，比中国内地的超市便宜了整整一半。有的仅为内地销售价格的1/4。

几年间，洋奶粉均价已经从200元迈上了300元大关。“洋奶粉”在中国内地的售价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最高。有分析人士认为，“洋奶粉”能多次涨价，根本原因有三条：首先是刚性需求，厂家看准了消费者不会因为婴幼儿奶粉价格高而不买。其次是国内的乳制品经常出现各种问题，给“洋奶粉”价格上涨的机会。最后，一旦认定小孩食用某品牌后家长很少愿意更换。

【点评】

国产奶粉不争气，进口奶粉连番涨，不管何种原因，“洋奶粉”价格超原产地4倍，在中国售价全球最高，这是一种非正常的市场现象。针对“洋奶粉”的价格机制，不知道物价部门是否有所干预。

说到底，不让“洋奶粉”在中国市场太霸道，关键还是要国货当自强。

漫画/**谢正军** 点评/**张玉珂**

你想正式被录用吗？先实习；你想实习吗？先成为银行VIP客户(存入人民币50万元)。16日，新华网报道，一家外资银行招聘“天价实习生”的特殊规定引起热议，该银行广州分行确认：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客户子女，并称“这是人之常情”。

银行“天价实习生”的铜臭味

“入其俗，从其令。”一句“人之常情”想必会让很多人心生感喟，又一项“潜规则”因为此事渐渐浮出了水面。其一，该银行未觉其规定有不当之处，很多人已经通过此途径进入实习甚至取得工作岗位；其二，其他外资银行也是用这种方法招聘实习生和员工的，法不责众，拿我开刀不合适。

不可否认的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情况现在仍未得到改变，即使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外资银行并未丢失在中国的“粉丝”。特别是对一些大学生来说，外资企业成为理想的就业方向，迈进外资银行的门槛就可能实现“高富帅”的梦想，可惜的是，那些在校期间靠汗水拼来的证书，可能统统敌不过一张VIP卡。

从个案分析，该银行的做法已经有违我国《就业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因为每一位劳动者都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大学生在面试时没有得到公平待遇，而且该银行在招聘过程中涉嫌搭售产品、违规发展客户，严重违背其作为著名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也有律师建议，相关受侵害者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该银行在招聘过程中违规搭售产品、发展VIP客户的行为，应赔偿其交通损失费以及因招聘歧视而造成的精神损失。

实际上，“天价实习生”只是一些外资企业“店大欺客”的缩影，现在是打破迷信的时候了。首先，诚信指数并不会因为是“国际知名”就会绝对高，在网上搜索该银行“金融体验生”招聘信息，信息多宣称，这是一个帮助在校大学生了解世界500强银行的运营流程、基本架构，学习银行基本产品知识的项目——看似出于公心做好事，可事实与宣传大相径庭。

其次，行业监管漏洞正在成为这些企业不断侵害中国客户的借口，并且屡试不爽。例如个别洋奶粉利用内地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常常推出新产品或升级配方以标榜“高端”、“超高端”误导消费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虚假广告宣传。还有一些食品企业，出问题之后常常拿“中国标准”说事儿，置企业社会责任于不顾，堂而皇之地歧视中国客户，赚得盆满钵满。

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并不是一味舆论谴责外资银行就能解决的。普通公众需要改变既往认知，不要过于迷信外来品牌，多关注产品和服务质量。有关监管部门则需要在完善标准制订的同时，加大对投诉热点的查处力度，不能因为他们是“请进来的”就网开一面或礼让三分。 **李光金**

官员“复活”“免职”只是挡箭牌？

因“4·28”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而被免职的原济南铁路局局长陈功、原济南铁路局党委书记柴铁民已经低调复出。2008年，胶济铁路事故造成72人死亡，416人受伤。(5月16日广州日报)

“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免职官员再次复出，而且位居高职，一如有网友感叹的那样，这完全是“满血复活”，你我情何以堪？

“4·28”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的血迹似在眼前，当时雷厉风行的免职处理如在昨天。曾经的事故与责任，曾经的问题与处理，在免职官员复出的所谓低调里，俱飘散在风中，刺眼而狰狞。

诚然，免职官员并非不能复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官员复出，该有底线和基本伦理，即“真问责、真复出”。问责严肃而认真，复出公开及公正。如此一来，有科学的程序在前，有公开透明的解释殿后，有免职与复出的公正厘定，自不会有如此多的口水与不满，也不必把复出总是弄得神秘兮兮，“低调”简约。不能容忍的不是免职后复出，而是免职后不透明、不公正的惩戒与复出程序。

还有个老问题是，按照《公务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公务员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六种，并不包括免职。这是否意味着，看似严肃和快速的免职处分，其实只是平息舆论和公众不满的挡箭牌与遮眼布？

邓为

贴近与换位就能拆除“社会墙”

在公众的概念里，999救护车提供急救服务，患者交付费用，乃公共服务+商业行为而已。在一些路人眼里，这种车总是来去匆匆。在一些司机眼里，这种车不拉病人也抢道，一置气就偏不让它。在一些读者眼里，999还似乎与120抢过“生意”。不管印象如何，终究都是站在远处，用不大相干的视角来审视的。

如果，我们拉近与它的距离，站在它的位置，和它有某种联系，999给我们的印象就会大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记者贴近、观察、体验、感受999后，写出的报道会令我们更加了解999，并深深感动。

原来，接线员每人每天要接听来电7000次左右，“您好，999，您需要救护车吗？”原来，他们全天候在岗始终保持急救体系各个环节高效有序运转，工作强度非常大。原来，他们因堵车迟到了经常会挨患者家属骂。原来，他们还有因社会车辆不相让摁喇叭、鸣笛不管用的无奈。如果再继续深入下去，去听每一位工作人员乃至他们的家属以及患者的故事，就会有更多的“原来”，有更多鲜为人知的酸甜苦辣。

这便是贴近和换位的力量。在贴近和换位之前，因为不了解，所以难理解，有时还会有误解、有曲解。其实不止999，众多的单位、机构、服务部门，甚至每一个陌生人，常常会令我们产生如许的隔膜。这便是社会学家所说的无形“社会墙”。不同群体之间，不同组织之间，人与组织之间，人与人之间，常常因为被城市的钢筋水泥困在办公室里、被庞大的互联网困在电脑终端前，使交往变少了，“社会墙”也便在无形中增厚加大了。

贴近与换位是拆除“社会墙”的有效路径。人的社会，只有交往多了，才会有更多的理解与尊重，有更多的关心和帮助，有更多的协同与合作，最终实现良性的秩序与和谐，那些矛盾、问题、毛病、不足、缺点等等，也都会在这种交往中祛除。

正如不是每个人都能走近999一样，每个人不可能完全与另一个人、另一个单位完成贴近和换位，媒体和记者却天然地承载了这种职能。媒体贴近基层、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把每一个角落的精彩故事都放在媒体这个公共平台上与公众分享，无异于架起一道社会交往的精神桥梁。而那道对社会发展有障碍的“社会墙”，自然被贯穿而通达了。 **乔子鲲**

据报道，一些国外政要纷纷在新浪微博“安营扎寨”，如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州长海涅曼，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欧盟轮值主席范龙佩，IMF总裁拉加德等，形成了颇有声色的“外宾扎堆”景象。

“外宾”扎堆开微博也是“工作需要”

微博是干什么用的？是用来说和听的。扎堆来中文微博安家落户的外国政要中，固有陆克文、萨特尔等精通中文的，但更多的是既不会说和看、也不会听和写中文的“纯老外”，为何选择来中文微博上“当外宾”？多半并非个人习惯或兴趣爱好使然，而只能是一种“工作需要”——这些外国政要，需要和看中文、写中文的微博网友交流。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提升，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和“角色感”大增，中国人、尤其普通中国人想什么，需要什么，有怎样的爱憎，对于“外宾”们而言，变得不再无足轻重，而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政纲、诉求，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而要直观、迅速、准确地把握这些，最好、最便捷、最经济的方法，莫过于用中国人的平台、中国人的语言和交流习惯，和中国人相互“听”和“说”，中文微博显然就是很理想的平台。

此外，随着开放的深入，如今移居海外的中国侨民、移民数量陡增，并一反传统海外华人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习惯，变得更敢于、善于表达自己意见。和以往不同，如今这些海外华侨、华人既注重“融入主流社会”，也更注重在多元文化氛围里，保持本民族的特色和传统，他们中很多人尽管长期在海外居住，但仍然习惯于使用中文网络平台。一些精明的外国政要正是看到这一点，才会跑到中文微博上又说又听，因为微博上既有他们想听到的声音，也有他们想交谈的对象。

既然人家是来说和听的，而且还是“工作需要”，那么大家就该对“外宾”扎堆抱持一种平常心，要学会多交谈，少围观，毕竟这种沟通和互动，不仅仅对“外宾”，对中国人也同样重要。 **陈在田**